

丛书主编 / 瞿林东

20世纪
中国史学
研究系列

瞿林东 / 主编

20世纪中国 史学发展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



瞿林东 /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 / 瞿林东主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7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

ISBN 978-7-303-10030-9

I. 2… II. 瞿… III. 史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660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页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3.25

字数: 362千字

版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4.00元

策划编辑: 李春梅 责任编辑: 李雪洁

美术编辑: 高霞 装帧设计: 高霞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瞿林东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抗争走向胜利、振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史学经历了伟大的变革、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反省。这些大多与中国历史进程相关联，也与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交往相关联。这是我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出发点。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引进了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从而引起了历史观上的两次大变革。进化论的引入，产生了中国“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引入，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走向近代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史学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这两次变革，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因为，历史观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20 世纪中国史学还继承和发展了 18 世纪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传统，同时又引进和借鉴了西方 19 世纪兰克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以其“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为特点，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填补了许多空白，大大拓展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内容，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同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同外国学者的历史研究相结合。这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的重要贡献。

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极有影响的史学思潮，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以至于都有可以传世的名著。正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著，使中国历史学在厚重的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珍贵品；正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著，使中国学人和广大读者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的社会革命、社会建设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循和运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目前各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中最合理、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里仅就后一个方面，结合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①；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19世纪后半期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③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关于

①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参见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16～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6～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③ 《当代中国史学·引论》，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判断，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论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①。唯物史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认可和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② 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二、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回答，这里讲几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性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作有系统、整体、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16～222页。

② 《历史哲学教程·序》，1～6页。



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进展都显得缓慢，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①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的。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宏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①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些，从几个重要方面表明了唯物史观是怎样的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

三、21 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指导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为此，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在思想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在，是到了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

^① 《民彝与政治》（1916年），《李大钊全集》，第一卷，156～157页。



候了。史学工作者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第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上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①，是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人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历史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

^①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二），59～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1 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史学工作者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需要在上述几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并不全是坦途，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和科学探讨的艰巨性决定了这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论战；五、六十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七、八十年代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以及史学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9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等各种观点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经过讨论和辩论，有些已获得共识，有些在认识上已比较接近，有些则仍存在歧异。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在学术研究中，对于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总是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阐释，而当旧的分歧消失的时候，往往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学术研究发展了，学术水平提高了，学术工作进步了。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之一。

为了推进学术讨论和争论，扩大讨论和争论的成果，“知人论世”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是后辈学人的本分和天职；反之，对于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持轻薄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因为那将走上自毁学术形象的歧路。

史学批评是保证史学之树常青的重要手段。积极开展史学批评是非常必要的。批评应当是善意的，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无原则地吹捧不是史学批评，当头棒喝似的指斥也不是史学批评，挖苦嘲讽同样也不是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应以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为出发点，以促进学术发展为归宿。史学批评往往又是同史学领域重大问题的讨论相联系的，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对于推进学术讨论、促进史学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方面，20 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一再证明，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同行的积极成果，是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大量的外国史学成果被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治学、研究，把中国史学介绍给外国同行，从而写下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极为活跃的一章。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趋势仍在发展，它必将有利于中外史学的进一步交流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中期，中国理论界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学术应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想，并为此作了实际的努力。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只是由于人们在史学活动中所具有的自觉性各有差异，以至于走过一些弯路，出现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出现了否定中国史学优秀遗产和排斥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倾向。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者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对于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合理、科学的论述，这种论述的观点、形式和语言应具有中国学人的风格和气派；而它的基本条件则必须批判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离开这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示。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面对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对着中国史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突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不是“保守”的心态，而且是在史学上自立于世界史学之林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的先辈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领域已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使史学家兴奋不已的事件，即新的历史资料层出不穷。不论是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出土，还是文书档案、传世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流传到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等，都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丰富了已知的历史内容，填补了未知的历史空白。记得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写一本运用考古学资料重现中国远古历史面貌的著作，可是他总下不了定稿的决心，因为每年都会有新的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被发掘出来，足以充实他的学说。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学界同样是存在的。

总之，20 世纪中国史学，在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的推动下，显示出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局面。其作者之众多，著作之繁富，也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史学不能比拟的。

我们撰写、编著《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这部丛书，就是基于上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

述认识而着手的。我们的宗旨在于：第一，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不同的视角，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作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的描述，使专业工作者有所参考，使更多的读者有所了解。第二，学术积累历来是学术工作的重要部分，昨日之学术乃是今日之学术的起点，今日之学术又是明日之学术的开端。21 世纪的中国史学，只有在充分认识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世界、面对未来，去开拓、创造新的业绩。

这部丛书的各位主编和作者，对丛书各卷的筹划、撰写、编次，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及各位责任编辑，对于史学领域学术积累工作的大力支持及辛勤劳动，使我们深为感动。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2007 年 1 月 15 日撰论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题 记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充满生机和创造活力的一页，同时它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过程，然而艰难和曲折并不能阻止它的前进和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中极其鲜明的反映。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和突出成就，使广大史学工作者对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本书的撰写宗旨，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一初步分析。而分析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明确地认识、总结和继承这份遗产中的珍品，更全面地把握和评价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面貌及其成就，更深刻地揭示史学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

本书的内容包含绪论、专论、后论三编：绪论论述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背景、总相和评价方法。专论分析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史学界的同行都很关注的问题。后论是对绪论和专论作扼要的概括，同时分析了中国史学将以怎样的面貌进一步走向世界。

本书是由一些同行分工合作撰写而成的，其三编的内容自有逻辑上的联系，而各章因论述上的需要则难以避免相互间的交叉以及重复。对此，祈请读者予以理解和原谅。

这里，我们以尊敬和惋惜之情，向本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表示深切的缅怀。他所撰写的《20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是一篇高屋建瓴、洋洋洒洒的宏文。观其文而想见其人，我们向芳川教授表示敬意和感谢！

本书各章撰写分工如下：陈其泰撰写第一、第十二章；瞿林东撰写第二、第八、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章；乔治忠、罗炳良、张越撰写第三章；侯云灏撰写第四、第五章；吴怀祺撰写第六章；向燕南撰写第七章；



张越撰写第九章；于沛撰写第十章；何芳川撰写第十一章。此外，张越、罗炳良、江嫒、李珍等几位博士曾参与本书初稿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全书由瞿林东教授通稿和修改，张越教授协助通稿并联系出版事宜，做了大量工作。

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初步分析，是一项双难的学术工作。本书存在的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我们既期待着同行的批评，也衷心希望有这方面的佳作面世。

瞿林东 谨记
2008年12月9日

目 录

上编 绪论

第一章

19 世纪后期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趋势

- 一、基本的走向和阶段性特点 / 3
- 二、关注的重点和主要成就 / 14
- 三、留下的思考 / 30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总相

- 一、怎样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 38
- 二、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 / 40
- 三、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 42
- 四、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分析 / 48

第三章

怎样评价 20 世纪中国史学

- 一、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 52
- 二、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 56
- 三、坚持辩证的观点 / 60



中编 专论

第四章

“新史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 一、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 / 67
- 二、何炳松译介的“新史学” / 70
- 三、“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 76

第五章

新历史考证学的成就与局限

- 一、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 / 86
- 二、新历史考证学之不同史家的学术特色 / 91
- 三、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成就与历史局限性 / 99

第六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

- 一、在斗争中发展起来 / 104
- 二、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的思考与分析 / 111
- 三、新时期历史学的巨大变化 / 119
-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实践 / 125

第七章

考古学成就与史学发展

- 一、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 135
- 二、考古学发展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 / 144
- 三、考古学发展与史学发展之关系若干问题的分析 / 155

第八章

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 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 162
- 二、20 世纪前半期的理论探索 / 167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

- 三、20 世纪后半期的理论建设 / 187
- 四、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 200

第九章

史学方法的演变及未来走向

- 一、历史进化观念是 20 世纪史学方法演变的先导 / 203
- 二、五四前后对“科学”的史学方法的重视 / 204
- 三、多样化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对史学方法的总结 / 207
- 四、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的兴起及特点 / 213
- 五、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在史学方法上的成就和失误 / 215
- 六、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对史学方法的多样化探讨 / 220
- 七、面向 21 世纪史学方法的走向 / 225

第十章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及其影响

- 一、外国学术思潮的传播和“新史学”的兴起 / 229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 / 233
- 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和苏联史学 / 235
- 四、中外史学交流出现新的高潮 / 237
- 五、关于“全球历史观” / 242
- 六、借鉴与创新 / 248

第十一章

20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 一、世界史是一个历史过程 / 250
- 二、中国的世界史学 / 252
- 三、中国的世界史学面临的任务 / 259

第十二章

史学的科学道路与民族形式

- 一、“新史学”思潮中的多样尝试 / 264